

中國文化

精神十六讲

邱丽梅 编著

ZHONGGUO
WENHUA JINGSHEN
SHIULIANG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精神十六讲/邱丽梅编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05-06840-0

I .①中... II .①邱... III .①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
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0511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4（邮购）024-23284321（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张：

字数：270 千字

出版时间：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艾明秋

封面设计：杨勇 白咏

版式设计：琥珀视觉-房婉璐 史轶楠

责任校对：高辉

书号：ISBN 978-7-205-06840-0

定价：36.00 元

目 录

第一讲 中华文明的起源	1
一、神话、传说和历史	1
二、神州大地上的古代居民	4
三、文明胎动时期的经济	5
四、社会分层	12
五、中华文明特质的出现	14
第二讲 殷周之际的文化变迁	20
一、殷商神本文化	21
二、西周的文化维新	28
第三讲 先秦儒家思想文化	35
一、孔子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36
二、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	39
三、荀子的思想	45
第四讲 先秦道家思想	55
一、老子的“道”	55
二、庄子论“逍遥”	61
第五讲 先秦时期的墨家与法家思想	71
一、墨子的思想	71
二、法家及其总结者韩非	76
第六讲 汉代新儒学	83
一、从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83
二、礼文化的完善	87
三、经学与讖纬	93
第七讲 佛教的东传及其对中国人的影响	101

一、关于佛教的一般知识	101
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105
第八讲 古代中国的道教	113
一、道教的产生和发展	113
二、永生的追求	117
第九讲 宋明理学	125
一、宋代儒学复兴的奠基人	125
二、北宋五子	127
三、理学的集大成者	133
四、理学与中国文化	137
第十讲 明清时期启蒙思想与经世思潮	145
一、早期启蒙思潮	145
二、启蒙思想的深化	154
第十一讲 16 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上）	161
一、西风东渐	162
二、近代思潮	167
第十二讲 16 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下）	175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175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	185
第十三讲 建筑艺术	195
一、宫殿	196
二、民居	203
三、园林	205
四、寺庙	210
五、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文化精神	213
第十四讲 雕塑艺术	215
一、彩陶艺术	215
二、青铜艺术	217
三、陵墓雕塑	219

四、石窟雕塑	225
第十五讲 古代文学	228
一、古代文学的演进	229
二、古代文学精神	244
第十六讲 书法与绘画	253
一、书法	253
二、绘画	263
参考书目举要	266

第一讲 中华文明的起源

人类的出现，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宇宙间的一大奇迹。

按传统的说法，人类古老的文明有四种，都是沿着江河发源的。这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与其他三大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却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

在中国大地上，大约在 1 万年前出现了农业，这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长远的基础。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逐渐变化。到了公元前 4000 年前后，社会所有层面的变化和积累似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此后，原本简单、平均、平等的氏族社会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史的正式开始。先夏大约 2000 多年的时间，显露出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个阶段，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和铜石并用时代。

一、神话、传说和历史

中国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的记述。早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就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在此之前尚有虞、夏、商、周之书。如果说商、周之书多是可靠的，那么所传虞、夏之书多为后人追述。再往前面追述便只有零散的传说，在可能包含有历史真实的传说时代以前的荒远年代，已经越出历史的记忆范围，在考古学发生以前，人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真实的知识，只能构建一个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的神话世界。而传说时代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也往往附丽以神话色彩。

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的神话，有女娲和盘古的故事。女娲的故事出现较早，《山海经》中便有所谓“女娲之肠”。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说女娲造了人类，谁又造了女娲呢？《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讲得比较详细：“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遐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人也。”一说女娲和伏羲均为华胥所

生，人身蛇躯，兄妹结婚繁衍人类。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壁画墓中，多有伏羲、女娲人身蛇躯交尾的图像，说明这个故事在古代是流传很广的。女娲补天的事首见于《淮南子》，其《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颡民生。”她创造了人类，还给人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天神。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五运历年记》又说：“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个故事可能产生于南方，而后在全国民间广为传播。创世神话中还有有巢氏、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制作网罟、神农氏教民稼穡等等，多系后人对往昔历史的逻辑推测，把人类产生之后一些重大发明附丽于几位想象中的圣王身上。

进入传说时代，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较多，各家说法不一，真假难辨。《尚书》追溯至尧舜，《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篇。于是人们常常把五帝所处的时代作为传说时代，五帝的历史便成为传说时代的主要内容。但在不同的著作中五帝的具体人物和排序多有不同。因为《史记》把黄帝、颡项、帝啻、帝尧、帝舜作为前后相继的五帝，所以影响较大。实际上传说中称帝的人物还有许多，反映当时大约是一种万国林立的局面，那些帝大约就是各个大小国家或部落的首领。各种五帝说的前三帝多有矛盾，但后两帝即尧、舜以及禹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在先秦的典籍中，舜继尧、禹继舜是没有不同说法的。

反映各民族关系的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件事，较早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较晚的是尧、舜、禹连续征伐三苗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上还难以得到印证，那么征三苗的事则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迹象，证明这一类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包含有真实的历史成分。

传说时代的各项事件中，影响最大、并且几千年传诵不息的莫过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在先秦典籍中，讲到大禹治水最生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段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 [yuè] 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其他典籍如《尚书》《诗经》《论语》《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也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或赞美之词。传说中讲到洪水的地方有很多，治水的人物也有很多，如共工、大禹的父亲鲧等。可见大多数人相信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洪水成灾的时期，治水是件极为艰难的事情，而大禹治水获得成功，无怪乎人们对他那样崇敬了。

传说时代的创造发明，大致有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仓颉造字，鲧作城郭，尧作宫室，化益作井，祝融作市，仪狄作酒，夔作乐，昆吾作陶，等等，把所有发明都系于个人不一定正确，也不足凭信，但如果不拘泥于个人而把那些发明看做是传说时代的产物，可能更接近于真实。可见，在传说时代，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文物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已略具雏形，从而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

传说时代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专职巫师的出现。《国语·楚语下》记颛顼时设立了专职的巫师，专门负责沟通民神与天地。这是世界宗教史上的通例，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

从以上情况来看，传说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一方面生机勃勃，充满着创造发明；一方面剧烈动荡，冲突不断，英雄辈出。那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文明的曙光开始从东方显露出来。

二、神州大地上的古代居民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考古学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在地质上的更新世早期，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的马圈沟等地都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石器，绝对年代都在 200 年以上。云南元谋上那蚌更新世纪早期地层中也出土了石器和人类牙齿化石，据古地磁测定大约为 175 万年。此外在湖北、重庆等地也有发现早期直立人遗存。这些遗存尽管还比较零散不丰富，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大，年代之早已经离人类起源的时期不远。

中国晚期直立人的资料相当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陕西的蓝田人、北京的北京人、安徽的和县人、南京的汤山人和湖北的郧县人等。其中北京人化石出自北京西南周口店，从 1927 年起连续多年的发掘，获得属于 40 多个个体的标本。据裂变径迹、铀系、热释光和古地磁等多种方法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 46 万—23 万年。北京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之一，资料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直立人的典型标本。

中国早期智人的化石标本也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有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陕西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安徽的巢县人和广西曲江的马坝人等。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有 40 多件，其中有比较完整的头骨的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黄龙人和贵州的穿洞人等。至于与晚期智人同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各个时期的人骨化石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承袭性与连续性。例如蒙古人种特有的铲形门齿，从最早的元谋人，经过北京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到山顶洞人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如面部较平、鼻部较宽、鼻骨较直等，在各个阶段的

化石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的承袭与连续，证明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以地区连续性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的基因交流为辅。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它们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原先在那里生活的早期智人。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理论是相冲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也是与这种理论不相符合的。

如果说种族主要是根据人类体质特征来划分，那么民族则主要是根据语言和文化等特征来划分的。中国现在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 55 个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约占 92%，少数民族人口不足 8%。各少数民族有相对聚居的地方，也有和汉族或别的民族杂居，相互通婚的情况也不少，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把这种关系形成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始原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公元前 6000 年或者更早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其中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中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六千多处，比较重要的有磁山文化，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600 年内；裴李岗文化，时代和磁山文化相仿；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代表。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格局。从而为以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

三、文明胎动时期的经济

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几个最古老的人类文明，都发生在最早出现农业经济的地方，都是农业文明。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农业作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口增加成为可能。而人口增加，社会关系就变得复杂。又是由于农业提供的食物储备，一些社会成员才有可能脱离食物生产，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乃至专门的社会管理，社会的经济、政治、艺术文化才会不断发展。总之，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农业的发

明乃是划时代的事件。在叙述中华文明起源时，要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开始。

在大多数中国神话传说中，农业是神农氏发明的。但是，神农氏是什么时候的人，古人就已经说不清楚了。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农业的萌芽是相当早的事情。

两万多年前，最后冰期越过最寒冷的峰值期，气候在一连串的剧烈波动中逐渐回暖。人们也从以狩猎为主的取食活动逐渐过渡为渔猎和植物性食物采集并举的广谱型采集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有关植物资源的了解，成为最终农业被发明的基础知识。

稻米是人类最主要的粮食之一。世界上的稻米分亚洲稻系和非洲稻系。非洲稻系原产于尼日利亚，亚洲稻系原产于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距今约 1 万年。在该遗址的三个层次，先后发现了水稻谷壳。经专家鉴定，前一次发现的稻谷属于普通野生稻，但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后一期发现的稻谷，属于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块中，发现了夹杂其中的稻谷壳和稻草痕迹，在陶片中也发现了夹杂的稻谷壳碎屑，其中有 4 粒稻壳形状比较完整。专家测定，该稻作遗存距今 9000—7500 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距彭头山遗址 25 公里的地方，出土稻谷、稻壳多达 1.5 万粒，距今 8000 年。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城址的城墙下，发现一块面积多达 100 多平方米的水稻田，距今约 6500 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稻谷。该文化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的年代距今约 6900 年。在第一次发掘的 400 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由稻谷、稻壳、芦苇茎叶等混杂而成的堆积层，专家估算，此处堆积的稻谷重量至少有 120 吨。说明河姆渡人的粮食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而且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在河姆渡文化之后，太湖流域的稻作业不断发展，目前至少已经在 20 多个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稻谷遗存，并出土了三角形铧犁等先进农具。还发现了 4000 多年前的水稻田，并有了

水沟和储水坑等，说明当地出现了水稻田所必需的排灌设施，基本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已经非常普遍，表明我国南方的农业文明已经相当发达。

由于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黄河流域居民的粮食以粟为主。我国出土粟的新石器遗址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距今约 8000 年的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磁山的第一、二期文化遗址，共发现灰坑 476 个，其中 88 个坑内发现了已经腐朽的粮食遗存堆积，据专家推算，储存粮食约 13.82 万斤。可见磁山人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的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当，已经发现 50 多处遗址。发掘情况表明，裴李岗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生活，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作物以粟为主。

这个时期，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农具多为木、骨质器具。河渡遗址上有很多发现。其中一种翻土用的骨耜，是利用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修整制作而成的，在骨白处着柄，形状和用法已经很接近现在的铁锹了。另外还有木铲、骨镰、木杵、石磨盘等粮食加工用具。北方土地干硬，翻土工具多为石锄、石铲、石镰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从耕作器具的类别看，当时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处在农业发展史上称之为耜耕农业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木犁和石犁，开始向犁耕农业迈进。

除了南方的稻和北方的粟，大豆也是中国人最早培育成功的。中国还是世界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 100 多种常用的蔬菜，有一半原产于中国。

家畜饲养，是同农业经济起源相关的。首先被人们驯化的动物是猪，也还有狗。较晚一些时候，又陆续驯化了黄牛、水牛、山羊、绵羊、鸡等动物。中国古代的所谓“六畜”中，除了马的饲养晚到了商代之外，其余者的驯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其中，猪是最重要的家畜，家猪饲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式。

中国还是最早驯化和饲养家蚕的国家。发达的农业文明不仅造就了我国新石器时期的灿烂文化，而且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化的登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手工制造业也在不断发展之中。神话传说中，有不少关于远古时代人们的发明创造的记载。从确凿的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称得上丰富多彩，主要门类有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蚌器、漆木器的制作等，稍晚一些时候还出现了铜器的制作。而一些出于材质原因很难保留下实物的行业，如纺织、编织、制革、缝纫以及酿酒、造醋、制盐等，也肯定是有。在这之中，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是关乎人们劳作和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两项技术。

石器的制作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的最古老的手工行业。早期的石器都是一些所谓的打制石器，即将石料打击劈裂，把那些有锋利边缘的石片和石块当做工具，用来猎杀和肢解动物等。随着更新世晚期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物性食物的采集乃至种植，便需要一些大型的砍伐工具和挖掘工具；又由于定居生活，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木工工具来建造房屋居住。这些器具要求有较大的体形、整齐的刃口和适合特定用途的特定形状，于是，方便加工出规整形状的琢打、砥磨等技术就逐渐发明出来，其产品，叫做磨制石器。为了处理那些必须炊煮方可食用的植物籽粒，人们又发明了陶器。这两项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主要标志。

适合农业经济生活需要的手工制造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告成熟。其标志是这些制品都是根据不同需求或功能，成套制作出来的。例如石器，可分农具、木工工具和狩猎工具，陶器则按炊爨、饮食、盛储的不同要求，质地不同、形状各异，而且一应俱全、固定搭配。其他如骨角牙器的制作，也是如此。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玉石饰品。由于居住稳定和近邻之间的交往，一个地区内的制造业技术特点和产品风格也就逐渐趋同而有别于其他地区，于是这些制品还被赋予了人群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

手工业的重大进步，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首先是传统制造业中出现了若干新技术。陶器制作普遍采用了可以轮转角度，以方便对器坯进行整修装饰作业的辅助装置—慢轮。陶器皆在挖筑的陶窑中烧成，一些地方的人们还掌握了烧制灰色和黑色陶器的闭窑和渗碳工艺。此外还有利用矿物质颜料装饰陶器、选择特殊陶土制作白陶的技术等等。这些技术进步使得产品的面貌焕然一新。北方地区装饰华丽的彩陶与南方造型复杂多变的陶器群交相辉映，成为时代之特征。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进一步发明了利用高速旋转的轮盘拉坯成型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产品外形规整美观，器胎薄厚均匀，更有胎厚不足一毫米、薄如蛋壳的精美制品。更为重要的是快轮制陶是一种可以较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它的发明，迟早要引起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革。这个时期的石器中，普遍采用了以砂、水为介质的石料切割法和钻孔技法。

其次，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制作的门类。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过木胎漆器。较晚一些时候，也是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丝绸。玉器的制作虽然早已有之，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玉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中的象征性功能越来越被人们，尤其是社会上层重视。为了烘托这种象征性，工匠们发展出各种专门工艺，制作出各种形状复杂的器物，并在表面雕刻出繁缛的纹饰，制玉也就逐渐从一般石器生产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行业。另一项意义深远的事物是铜器的出现。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仰韶文化临潼姜寨出土的经铸造而成的一块黄铜片和一根黄铜的管状物，距今约6000多年。马家窑文化地层中出土过一把铜刀。距今5000年。到了公元前3000年以来，铜器在各地普遍有所发现，说明此时的铜器制作已经不是偶然的現象了。这些铜器一般是刀、凿、锥、钻之类的小型工具，也有铜泡、指环、耳环、手镯之类的饰物以及铜镜，除了少数系锻造外，多为铸造。

新石器晚期以来更重要的变化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领域。随着手工制造业的技术越来越复杂和高效，一些制造者也就开始某种程度的脱离农业，向专门化发展。例如此时的长江流域，出现了两个石器制

作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在长江三峡及靠近出口的湖北西部，另一个在南京至巢湖一带。在这些地区的遗址上，不仅出土的成品石器制作精良，还往往发现大量石器半成品和石片碴等废料，有的还发现有制作石器的房屋建筑，甚至遗址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石器加工厂。这种规模的生产，自然不会全部用来自己消费，而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此时的制陶业也萌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至于铜器和玉器这类高技术产业，专门化程度更高。制造这些器具从开采原料到加工出成品，必须经过许多复杂的工艺环节，非一人可以胜任，也即在这些手工业门类的内部，出现了不同工艺环节上的专业分工。

至此，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也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了。这必定引起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和多样化，促进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复杂化起来。

最后，发生在制造业内部的一项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贵族的手工业。公元前 3000 年以来，专门服务于贵族的手工制造行业已经颇具规模，包括玉器、丝绸、漆器、象牙器、高档陶器的制作。这些产品有的原料稀有难得，有的制造技术复杂，远非一般人可为。良渚文化玉器十分流行，常见的玉器有琮、璧、钺、柱形器、镯、环、璜、玦、三叉形器、梳柄、锥形器、管、珠、半月形牌饰、带钩等二十余种。最能代表其制作水平的是一件出自余杭反山 12 号墓的玉琮。该器物外方内圆，器高 8.8 厘米、射口直径 17.1~17.6 厘米，重达 6.5 公斤，堪称琮王。器物通体呈乳白色，四面直槽各有两个羽冠人面兽身的神人徽像，每个神徽大小仅 3 厘米，是用减地法将周围降低，把神徽外部轮廓浮现出来，再以阴线刻神徽的形体轮廓，并在轮廓内部充填细密的卷云纹，其刀法之细腻，在 1 毫米宽度内，竟并列雕刻线条三四根之多。与玉器同样珍贵的，也许是象牙器了。这一时期各地都发现过一些精雕细刻的象牙器，例如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镂空透雕象牙梳、仿玉琮造型的象牙雕筒，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流

行造型典雅的黑色陶器。其中的精品，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的一些陶鼎、双鼻壶、宽把杯、豆等表面都被打磨得黑亮照人，进而用锐利的工具刻满流云、飞鸟、盘龙之类的纹饰，而宽把杯的把手，常常是用几十根细约 1 毫米的泥条编排而成的。龙山文化的陶器虽然不以纹饰见长，但其特有的细泥陶高柄杯，胎薄如蛋壳，即使用现代技术，也少有仿制成功者。这样的陶器制作起来，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大量工时，数量自然不会很多。

这类华美的精品数量很少，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在夏、商、周三代，玉琮、玉璧是重要的宗教法器，钺则是军权王权的象征。这些物品往往集中出土在少数特别营建的大型墓葬中。这类大型墓葬不仅规格大，还有一般小型墓葬所没有的棺槨葬具，墓葬的主人显然是一些社会上层人物，而这些手工业也显然是专门服务于他们的。

建筑和建筑技术，是反映人们技术和创造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村落里，房子多为面积不大、结构相对简单的窝棚式建筑。但不久，各地的建筑业就发展起自己的特色。气候比较寒冷干燥的黄河流域以及更北的地区，流行半地穴式房子。江淮地区湿润多雨，故多为平地起建的地面建筑。在河网密布的江南，人们发明了干栏式建筑。

当时的建筑水平，还体现在一个建筑群—村落的整体规划设计方面。典型的村落通常有一道人工开挖的圆形壕沟环绕保护起来，内部的房子或者成排、或者聚成若干小群分布，房子的附近散布着一些贮藏什物的窑穴，有的还有牲畜圈栏、陶窑等设施，整个安排井然有序，处处体现着氏族社会生活的原则。

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开始，建筑业出现了几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分别是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

江南地区也许是因为多雨潮湿的原因，对耐久的建筑材料有更大要求，于是人们发明了烧制土砖。同时期的北方地区开始使用土坯建房子，烧制石灰涂抹室内地面和四壁。此外，还有更高级的地面处理方法。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房子 F901 的室内地面十分光洁

平整，为一层厚 15~20 厘米的沙粒、小石子、人造陶制轻骨料和胶结的混凝土层，强度竟和现代 100 号水泥相仿。

打井和夯筑技术是更具社会意义的发明。有了水井，人们就可以在远离自然水源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如交通和贸易物流枢纽、重要原料产地、军事防御要地等——定居或驻守下来。在夯筑技术普及的地区，人们彻底淘汰了原来的那种低矮潮湿的半地穴式房子，改为高爽的地面起建式住宅，很多这种房子还建造在夯打起来的台基之上。而这种台基式、多间隔的土木结构建筑，正是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夯筑技术使得修建更大规模的建筑物，如城墙、大型宫殿等成为可能。

总的说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是史前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无论手工业还是建筑业，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走向文明做好了物质的准备。

四、社会分层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从村落到国家的演变历程。这种情况，从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集约性采集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走向定居，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小的聚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区的聚落明显扩大，一个聚落有几十座以至上百座房屋。聚落的布局往往是凝聚式的，房屋虽然略有大小但没有质的区别，反映一种自给自足的平等的有组织的社区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规模有所扩大，至少在农业区如此。聚落布局往往是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同时内部又是有区别的。从房屋、墓葬和一些生产设施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社区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平等的、有组织和有相当凝聚力的。不过有些产品的交换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长江三峡地区土地狭窄不宜耕作，但江边的砾石却是制作石器的好原料。那里的聚落便以制作石器为生，并且初步形成